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

风险防范化解的经济学思考

刘尚希

当前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也充满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是一个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要树立底线思维,用“木桶原理”警示全党既要善于补齐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我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防范化解风险提出的重要要求,坚持战略思维和系统思维,提高科学预见能力,辨识各类风险挑战,在大变局中赢得发展主动。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风险

风险与不确定性直接关联,如果这个世界都是确定性的,那就没有风险可言。现实生活中,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外部环境复杂,风险挑战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从横向上看,全球风险上升且难以预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原来构建的规则在失效,秩序被打破,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从纵向看,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呈现“加速度”态势。农耕社会是“慢变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000年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工业化之后,变化开始加速,进入“快变社会”,100年就会有大的变化。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信息社会,数字化、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速度更快,10年就会有不小的变化。在社会加速变化的背景下,一般风险演变为重大风险的频次多了,演变速度也加快了。

以系统的思维审视风险

经济系统是嵌入社会体系之中的,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经济风险也随之增加。

从经济循环与风险循环的逻辑关系看,经济循环主要体现在“支出—收入”之间的循环、“资产—负债”之间的循环等,风险也蕴含在其中。例如,居民部门在企业部门购买产品,企业部门收回成本、获得利润就有钱雇用劳动力,劳动者拿到工资就有消费支出,收入

和支出之间形成循环。如果循环不畅,甚至出现严重内需不足,就会形成供需负反馈,造成风险累积,风险累积导致的宏观效应就是储蓄与投资失衡、供给与需求失衡。宏观经济平衡的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如果储蓄和投资失衡,就意味着市场没有出清,需要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维系这个宏观平衡条件。又如,负债形成资产,资产收益偿还债务,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流动性风险和资产贬值风险。

从风险循环联动看,当某个企业出现问题,风险外部化之后,风险越积越多并扩散、公共化,变成公共风险,即转化为宏观风险。一旦公共风险上升,很多企业都会感觉到压力。风险循环因参照系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经济高速增长趋势下,个体风险外部化下降,公共风险呈收敛趋势。而在经济下行趋势下,个体风险外部化上升,违约增多,公共风险呈扩散态势。

防控重大风险,首先要认识到风险循环,知道从何处下手、解决什么问题。在风险公共化过程中如果形成了关联效应,就要及时斩断,尽快转变预期,不要让所有企业遭受压力。对风险循环的状态要及时作出判断,不要错过低成本防范化解风险的机会,否则演变成危机,化解成本更高。

及时防范化解公共风险

充分认识政府在公共风险中的职责任务。政府作为公共风险的管理者,目标是公共风险最小化。公共风险最小化可以使宏观确定性最大化,进而自然就会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市场交易是有风险的,比如股市有风险,人们进入市场要做好准备。政府只要定好规则并进行监督,就可通过市场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优胜劣汰。但如果变成了公共风险,大家无力化解,就需要政府出手。公共风险最小化之后,市场就可自主正常运行。

准确把握政府管理公共风险的职能定位。从方式看,政府管理公共风险就是遏制风险循环累积扩散。首先是防范,避免个体风险外溢而公共化。当一个企业出现风险且风险外溢越来越大的时候,如果政府判断有可能变成系统性风险,并进一步蔓延成公共风险,就要及时遏制,避免个体风险公共化。其次是化解,避免公共风险导致市场收缩。如公共风险已经形成,要及时处置,避免内部化,导致经营主体的风险成本上升,从而产生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特别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悲观预期。政府管理公共风险要从薄弱环节入手,遏制风险循环。从手段看,要增强契约的完备性。如果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拖欠时间越来越长,就容易导致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出问题。如果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就会增加。同时,如果法律、制度、政策不完善,公共契约的不完备性就会扩大。增加契约完备性需要以法治和政策为保障,以改革为动力,形成一个制度性安排,让经营主体有长远的预期。

灵活运用政府管理公共风险的政策工具。一是提供“风险市场”,包括保险、银行、证券、期货及其衍生工具,微观主体在这些市场上转移风险、分散风险、套期保值,让风险消化在市场内部,避免了风险外部化上升为公共风险。但这些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需要去组织和监管。二是提供无风险资产。国债被视为无风险资产,是风险资产定价的基准。优化国债的品种结构、促进国债流通,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是完善资本市场、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关键,需要抓紧推进。三是更好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推动实现宏观流动性充裕稳定、币值稳定、估值稳定。此外,当其他主体买不起单的时候,就得由政府出手。风险救援的对象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有效的风险救援是当今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防范经济金融危机的先手棋。风险救援首先要切断风险传播链条,避免风险进一步公共化。需要强调的是,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冲重大风险的工具。公共政策是一个工具箱,是一个政策体系,通过不同政策组合来对冲经济风险、失业风险、自然风险和外部风险。要按照风险生成的内在逻辑

辑,区分轻重缓急,抓住风险链条,精准实施政策。风险权衡非常复杂,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判断,不能从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部门去看。各自为政,容易产生“合成谬误”,引发新的风险。风险权衡,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考虑社会因素,需要有整体观。

把握好出清风险与稳定预期的关系。在风险社会中,行为主体的目标由利益最大化转变为风险最小化,这个时候只有出清风险才能改变预期,才能出清市场,让经济产生活力和内在动力。出清风险并非让风险清零,事实上风险永远存在。风险出清的对象是公共风险或正在公共化的风险,而不是市场风险。市场风险不需要政府出清,恰恰是优胜劣汰机制所必需的。要把防风险稳预期放在首位,避免宏观风险预期上升。从国内风险来讲,要有效遏制房地产、地方债等领域的风险循环累积,增强政策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落实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举措,做好加强产权保护、理顺央地关系等方面的工作,形成遏制风险循环累积的制度性安排,更好引导社会预期。从外部风险看,大国关系、周边关系是重点,要防范外部风险输入导致内部风险上升,通过风险权衡去应对充满风险的世界。

总之,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仗,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仗。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经济发展大趋势,不断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数字化、绿色化为特点的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孕育。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引擎,也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需深刻理解培育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统一性,以新质生产力为支点,撬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深层动能,拓展发展新空间。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生产力质态。当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与应用,并引发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便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

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需依赖于特定的空间载体与发展环境。审视我国区域发展现状,不平衡不协调的深层结构性问题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瓶颈。创新资源分布不均、部门区域之间条块分割、产业同构与低效竞争并存等现象,导致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在区域间难以实现高效耦合与有机协同。一些地区虽拥有创新资源,却因腹地支撑不足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一些地区虽有转型意愿,却苦于高端要素匮乏,步履维艰。破除区域壁垒、优化要素配置、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亟需把握机遇,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构筑区域协调发展的新优势。这要求既要做好顶层设计,又要因地制宜激活潜能,以精准布局形成共促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以创新协同网络贯通区域“主动脉”与“毛细血管”。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科技创新,要求推动形成更加完善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打破区域壁垒,促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平台、专家人才等创新资源在更大范围共享共用。通过跨区域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共建产业创新中心、设立“科创飞地”等,促进知识溢出、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让创新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构建层次分明、优势互补、高效联动的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使创新势能加快向发展新动能转化。

以深度协作构建产业梯度布局的雁阵格局。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在通过全面创新,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应基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科学引导产业布局优化与有序转移。东部发达地区需发挥头雁作用,聚焦前沿领域探索、颠覆性科技创新、未来产业孵化等,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应把握机遇,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依托本地特色资源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空间上合理分布、技术上紧密关联、价值上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

以制度集成创新打通要素流动的“任督二脉”。培育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协调发展,均需破除制度性障碍。要持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破阻碍技术、数据、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壁垒,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互助等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园区共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融合应用和价值释放。

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优势,必须建立在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要落实好区域主体功能区战略,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健全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支持生态功能区发展生态经济。推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开放合作、协同保障的区域能源体系,打造绿色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各地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将生态“颜值”有效转化为经济“价值”,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甘肃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本版编辑 秦悦美 编夏祔

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郭田勇

保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发展科技金融能够有效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以金融力量激发科技创新的最大效能,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总结科技金融发展的成效与经验

近年来,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成效显著,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持续优化,资本市场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为科技型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金融服务。

顶层设计与不断完善。国家层面对科技金融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政策供给持续强化。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全面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强度和水平,为各类创新主体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今年5月,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聚焦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方面提出举措,为科技金融制度安排和工具创新指明了方向。

产品体系日益丰富。在政策推动下,科技金融工具箱不断丰富。中国人民银行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出债券市场“科技板”,允许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并创设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有效增强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意愿和经营主体的融资信心。

资金规模显著扩大。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科技贷款余额达44.1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增速比同期全部贷款高出5.8个百分点,体现了科技信贷在金融投向上的优先性

和高增长性。债券市场快速发展,已有288家主体发行约6000亿元科技创新债券。这拓宽了科技型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并降低其融资成本,体现出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

但也要看到,我国科技金融发展仍面临一定挑战。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更偏好抵押充足、现金流稳定的企业,而科技型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大多轻资产、盈利模式不成熟,难以满足传统信贷要求,导致银行“不敢贷”或“不会贷”问题仍较突出;风险投资市场的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市场化程度和投资效率仍有提升空间,资本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民间资本参与度偏低;政府投资基金的运行机制尚需优化,在资金投入和管理流程上仍有改进空间,还存在“重投轻管”的现象。

形成高度适配的金融支持机制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体系,应准确把握我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生态的独特性。既要正视我国以银行业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也要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因地制宜推动机制创新,形成契合中国国情、适应科技发展规律的金融支持机制。

一是充分发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的主渠道作用。间接融资体系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与我国居民储蓄率高、风险偏好低等行为模式相契合。当前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机构总资产比重约90%,银行作为金融资源配置主力,具有资金规模大、覆盖网络广、风控控制能力强等优势,其作用不可替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体系,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而要在充分发挥间接融资主渠道基础上,推动间接融资理念、机制、产品、风控等全面优化,更好适配科技型企业的发展特征。

二是提升银行服务科技创新能力。银行要在科技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服务科技创新为战略任务,为科技型企业提供

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需紧密结合企业特性和需求,不断研发适合轻资产、高成长特征的产品。构建适合科技型企业的全面风险评估体系,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基于企业科技能力、创新潜力和市场前景的多维度信用评估模型,适当提升风险容忍度,积极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创新模式。

三是完善投贷联动机制。科技型企业普遍经历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发展阶段,具有投资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等特点。投贷联动是破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的重要途径,银行可在政策支持及合规框架下,通过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方式,开展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投贷联动机制将贷款与股权投资有效结合,既能使银行享受企业快速成长带来的股权增值收益,又可通过贷款支持解决企业现金流需求,有效降低单一融资方式风险,实现银行与企业的长期共赢发展。

四是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金融管理体系,明确功能定位,更加注重中长期价值,发展耐心资本,强化对创新生态、产业体系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支持,引导资金投向具有战略性、牵引性的创新项目。坚持市场化运作,完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提升投后管理和产业协同水平。

五是畅通科技型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持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深化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改革,畅通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拓展债券市场融资空间。完善科技型企业信息披露与信用评价机制,提高市场透明度和资源配置效率。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参与的积极性,打造多元资本投入的科技金融生态。借鉴发达国家风险投资体系市场化经验,通过税收优惠、基金引导等手段,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和退出通道,提升民间投资回报预期和风险容忍度。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